立法长廊

最高法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

激发创新活力 规范市场竞争

本报消息 为正确审理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引发的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解释》明确,特定商业领域普遍遵循和认可的行为规范,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商业道德”。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行业规则或者商业惯例、经营者的主观状态、交易相对人的选择意愿、对消费者权益、市场竞争秩序、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等因素,依法判断经营者是否违反商业道德。人民法院认定经营者是否违反商业道德时,可以参考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者自律组织制定的从业规范、技术规范、自律公约等。

《解释》指出,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且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经营者事前未明确提示并经用户同意,以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等方式,恶意干扰或者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予以认定。

《安徽省教育督导条例》6月1日起施行 “双减”被纳入教育督导内容

本报消息 日前,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省教育督导条例》,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接下来,安徽省将按照该条例的规定和精神,制订出台《安徽省教育督导问责实施细则》,以有效问责确保教育督导效果。

针对教育教学中的热点问题,该条例充实细化教育督导事项,规定了学校党建团队建队建工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教育教学环境优化、校长队伍建设、教师人员配备、职称评定、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落实、违规补课行为查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教育评价改革、师德师风建设、招生、收费、卫生防疫、学生欺凌防控、家庭教育指导等教育督导事项。

浦东新区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若干规定施行 高频备案事项改为自主公示

本报消息 日前,《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施行。从行政“许可”到行政“确认”,一词之差,却迈出了商事制度改革中的关键一步。

《若干规定》明确由登记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对市场主体的主体资格和登记事项予以认定并公示,最大限度将企业经营自主权交还给企业 and 市场,准入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降低。

《若干规定》构建了以信用分级为标准的监管体系,将高频备案事项改为自主公示事项。市场主体只要在设立或者事项变动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一网通办”平台公示有关信息即可。

厦门拟立法明确辅警职责

明确法律地位 厘清职责权限

本报消息 福建省厦门市司法局近日发布通知,就《厦门经济特区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意见。

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分别明确了文职辅警和勤务辅警的工作职责;同时,列出了辅警禁止从事的8类工作,如:政治安全保卫、技术侦察、反邪教、反恐等;办理涉及国家秘密事项;案件调查取证、出具鉴定报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执行刑事强制措施;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审核案件;保管武器、警械;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从事的其他工作。

此外,草案征求意见稿中还规定了辅警对警用装备的使用权限。辅警履职期间可以驾驶警用汽车、摩托车、船艇等交通工具。

辅警在协助人民警察开展巡逻、检查、抓捕、押解等工作时,遇到有危害公共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和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在人民警察的指挥和带领下,可以使用警棍和必要的约束性警用器械。辅警不得携带、使用武器。

代表建议优化网络游戏实名认证流程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须压实平台责任

“123579”,熟练地输入密码后,7岁的棒棒顺利解锁了手上的平板电脑,然后打开某短视频平台刷了起来……

如今,像棒棒这样的“小网民”越来越多。据统计,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83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4.9%。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网络与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张韬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细化并压实了网络平台的责任,有助于提高网络保护意识,将监管保护落到实处。

确保账号注册者使用者一致

谈起网络,很多家长又爱又恨,他们既希望孩子通过网络接触更多领域,又怕自制力差的孩子深陷其中。

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责任义务,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看来,完善防沉迷制度,关键在于用户实名制落到实处。

2021年8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

但在实际中,由于部分平台在进行

实名认证时的身份认证程序要求较为简单,非常容易“绕过”。张韬指出,网络天然的虚拟特性容易出现实际上网过程中实名者和使用者不一致的情况,且网络服务以手机App形式较为常见,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便捷、可独立操控的上网渠道。比如,一些未成年人使用长辈身份信息或购买成年人身份信息就可以轻易绕过实名认证。

“落实用户实名制,不仅要实名认证,还要进行实名认证,防止假冒他人身份、借用他人身份进行注册登记,以及未成年人租用、购买成年人的账号进行使用。”赵占领指出,这就要求在用户注册时不仅要提供身份证照片或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还应加入人脸识别验证,对于网络游戏而言,不仅注册时要进行人脸识别,在登录时也应进行验证,以确保账号的注册者与使用者一致。

在去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也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类似观点。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聂鹏举建议优化网络游戏实名认证流程,引入人脸识别双重检验程序。

“不仅要注册账号时对提交实名认证的身份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检验,还应在后续游戏运营中提高对身份信息的检验频率。”聂鹏举建议每次登录游戏都应进行人脸识别,以检验注册时认证的身份信息与账号使用者是否匹配,充分发挥限制未成年人游戏时段时长的作用。

“让网络实名制和未成年人游戏防沉迷系统真正得到有效落实,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配合、多管齐下。”张韬注意到,征求意见稿除明确平台建立健

全防沉迷制度的责任义务外,也提出了要加强学校、监护人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预防和干预。比如提高教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早期识别和干预能力,加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监督等。

落实网络实名制,还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被采集滥用等问题。张韬指出,征求意见稿对此明确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采取充分必要和严格的措施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这将有效减少网络实名制的弊端。

制定统一的青少年模式标准

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适龄提示标准规范,根据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通过评估游戏产品的类型、内容与功能等要素,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的要求。

在去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提出尽快建立网络游戏分级制度的建议。

“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网络游戏分级制度,使不同年龄段的人玩不同等级的游戏。”李君认为应尽快完善网络游戏市场监管机制,明确网络游戏相关职能管理部门职责分工,对游戏分级、内容审核等方面监管落实到位,形成以法律法规、行政监督、行业自律和技术保障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强化网络游戏监管力度。

赵占领补充指出,还应明确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的具体种类、范围、判断标准和提示办法。对于网络

核心阅读:

互联网在扩宽未成年人学习、交流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沉迷网络、遭受网络欺凌等问题。为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3月1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共7章67条,内容涵盖预防网络沉迷、个人信息保护、防治网络欺凌等。

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的青少年模式,也应制定统一的标准,包括进入青少年模式后展示的信息以及退出青少年模式的方式等。

出现网络欺凌可以关闭账号

性格开朗活泼的初一女生,却因为某公众号的恶意造谣,被指认为“渣女”,最终被迫向公众号付费删帖……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和传统校园欺凌相比,网络欺凌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可能会更大。”赵占领指出,网络欺凌一般是指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采用传播谣言、威胁、骚扰等方式,故意且重复对他人进行攻击。这种方式不受空间、地点等限制,且信息会在网上广泛迅速地传播,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和心理负担。

针对网络欺凌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在去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建议在法律法规中完善网络平台以及网信部门的管理责任,并对网络信息进行事先审查和过程监督。要通过人工智能等方式,对图片、文字、语音等进行识别,过滤显而易见的违法侵权信息,对于其他较为隐蔽的侵权信息,可由受害人通知后,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

征求意见稿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者恶意损害形象等网络欺凌行为。同时,明确了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设置便利未成

年人及其监护人保全遭受网络欺凌证据、行使通知权利的功能、渠道。遭受网络欺凌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有权通知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关闭账号等必要措施,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防止信息扩散。

“此前出现网络欺凌,平台一般只能施以警告或扣除用户一些信誉积分,并没有赋权关闭账号这一功能。”在张韬看来,赋予网络平台关闭账号等治理措施能够在最短时间内避免网络欺凌事件造成更广泛传播,及时避免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和信息在更大范围内泄露,这是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点。

张韬指出,在具体执行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将制度落实,通过设置重点监控和及时筛查机制对网络欺凌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实施关停账号后对于账号内相关证据的存储,保全应当建立合理的保管机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

针对网络欺凌等给受害者带来的精神伤害,方燕建议加强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应当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殊情形。

方燕认为,未来可由最高法院通过指导性案例或批复、答复的形式加以明确。例如,对经过专家诊断有精神上遭受重创的诊断结论、需要进行心理康复治疗的患者,应当认为属于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

(据《法治日报》)

IT青年缘何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帮凶

代表提出坚持源头治理完善网络诈骗法律法规

一些大中专院校甚至名牌高校毕业的IT青年,却成为涉诈App的“制刀者”,由他们制作的“刀”,从成千上万的群众钱包中“收割”了上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注意到,在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涉诈案件中,不法分子利诱年轻技术人员,向他们订购涉诈App,使他们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背后的“制刀者”。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年轻技术人员更是参与研发,成为黑灰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在去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洪宇提交了《关于加大对利用App诈骗犯罪治理力度的建议》,建议通过源头治理、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管等多措并举的方式,加大对利用App诈骗犯罪的综合整治力度。

对于周洪宇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均十分重视并作出回复,认为他的建议有助于改进相关工作,将认真研究,持续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严惩态势。

IT青年沦为“制刀者”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多发,不法分子作案手段不断翻新,黑灰产业链条盘根错节,成为民众反响强

烈、深恶痛绝的“急难愁盼”问题之一。

全国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出重拳、下狠手,坚决守好民众“钱袋子”。2021年,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4.1万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9万余名,打掉涉“两卡”(手机卡、银行卡)违法犯罪团伙3.9万个,追缴返还民众被骗资金12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年轻技术人员不仅充当了“制刀者”的角色,还会私下“接单”、参与关键环节,逐渐发展成接单、开发,到封装、分发、售后等“一条龙”技术开发黑灰产业链。

公安部网安局2021年公布过这样一起案例:2020年12月,民警奔赴湖南等地成功抓获彭某等犯罪嫌疑人3名,扣押手机30余部,缴获违法App源代码10余套。该团伙成员均为国内顶级重点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技术实力处于行业第一梯队,实属高端人才。被这个团伙坑过的受害人遍布全国,涉案金额超1亿元。

办理多起相关案件的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任巍巍这样为“制刀者”画像:90后、IT男为主、大学以上学历,多以“技术中立”为挡箭牌,长期游走法律边缘。

“毕业于名校的IT青年成为‘制刀者’,除了利益驱使,最主要的是法律观念淡薄,很多人带着‘技术中立’的思维做这件事,或者并不知道自己写的代码最后会被拿去用于诈骗。有的没有意识到违法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有的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周洪宇说。

源头治理严把教育关

“集中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相关内容,不仅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两高”工作报告中,也是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

多位代表建议,要严把“教育关”“上架关”“制度关”,从源头加强网络诈骗治理。

周洪宇建议,要坚持“源头治理”的思维,以“精准滴灌”的方式,针对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开展法治教育和思政教育,引导IT师生不做虚假App的技术助攻,发挥专业力量参与反诈,变诈骗“制刀者”为反诈“战斗员”。同时,网信部门应加强对App的监管力度,特别是确立对未在申请商城上架App的监管方式,堵住监管漏洞。还要建立严格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对涉案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从业禁止。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到,2021年,检察机关针对一些在校学生涉案,会同教育部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校园反诈,既防学生受害,也防受害参与害人。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公安厅物证鉴定管理处(中心)副处长(副主任)陈林认为,在校学生可能是被害人,也可能是诈骗参与者,检察机关通过这一有力举措,向学生等易受骗群体揭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危害性以及防范提示,既能有效提高他们的防范意识,又能避免他们“误入歧途”,更好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司法保障。

建立App市场准入制度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回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问题。今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根据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今年将制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

多位代表认为,加快制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有利于更好预防、遏制和惩治电信网络诈骗,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在立法时要设立App市场准入制

度以及开发、封装、分发等各类主体实名认证备案制度,制定行业规范、定期核查,从制度层面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通信网络环境。”周洪宇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原行长张智富建议,加快出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进一步加大对违法个人和单位的惩戒力度,为行业源头治理提供充分保障,建立跨部门监管协调工作机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本低、回报率高,而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对实施及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主体责任个人、团伙和组织应承担的法律职责阐述较为笼统,惩罚力度较弱,违法成本较低,对不法分子的震慑力不强,不利于电信诈骗的源头治理。建议加大惩戒力度,在法律层面提高处罚标准和犯罪成本。”张智富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原行长周振海认为,应当在立法时进一步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的全链条治理。

周振海建议,明确金融、通信、互联网等行业主管部门依照职责负责本行业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承担行业监管责任;明确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单位对物流信息、购物信息、贷款信息、医疗信息等可能被电信网络诈骗利用的重要信息实施重点监管和保护;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方面应当加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众对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的鉴别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明确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监测系统,实现涉诈数据共享。

(据《法治日报》)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后正式施行

织密信息安全“防护网”

由13个部门联合修订发布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日前开始施行,受到广泛关注。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办法》进行修订,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保障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维护国家安全。

平台出海有“规定动作”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应用加速发展,在通信、支付、购物、视听等领域都涌现出一些体量巨大、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平台,其中不少已赴国外上市或有相关计划。

“网络安全审查不会限制开放,启动审查后,经研判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可继续赴国外上市。”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杨旒旒说,开展网络安全审查是国际通行做法,有利于推进中国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与此相呼应,《办法》对审查的工作机制、工作流程等进行了适当调整,例如增加了证监会作为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位,以及上市申请文件作为上市审查申报材料的一部分等。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工程师唐旺说,如果互联网平台不遵守国家有关网络安全要求,不落实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责任义务,上市后在金融力量影响下无序扩张,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将成倍扩大。

业内人士认为,将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纳入网络安全审查,是《办法》修订的一大亮点。从实际情况看,走

到出海外上市这一步的平台,用户数很少有低于上百万级别的。《办法》的修订意味着今后网络安全审查成为平台出海上市的“规定动作”。

“网络安全审查不会限制开放,启动审查后,经研判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可继续赴国外上市。”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杨旒旒说,开展网络安全审查是国际通行做法,有利于推进中国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与此相呼应,《办法》对审查的工作机制、工作流程等进行了适当调整,例如增加了证监会作为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位,以及上市申请文件作为上市审查申报材料的一部分等。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工程师唐旺说,如果互联网平台不遵守国家有关网络安全要求,不落实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责任义务,上市后在金融力量影响下无序扩张,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将成倍扩大。

业内人士认为,将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纳入网络安全审查,是《办法》修订的一大亮点。从实际情况看,走

对性的优化,审查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

为数字经济护航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作为国家新型生产要素和基础战略资源的代表,数据安全已成为保障网络强国建设、护航数字经济发展的安全基石。《办法》规定,数据安全也是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重要内容,将数据安全风险作为网络安全审查的重要审查因素,并在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价的基础上,新增了国家数据安全风险评估评价。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李雪莹说,修订后的《办法》增加了多项数据安全相关条文,对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更高,覆盖对象的范围更广、审查指标更加量化。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委员黄敏提醒,数据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重点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数据、重要数据等。

“此次修订以维护数据安全为中心,以做‘加法’的方式,新增了不少亮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和信息化法治研究院研究员雷文说,推行网络安全审查,加强风险识别和控制,已成为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的通行做法。《办法》的施行,也将提高全社会对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

多方合力依法治网

网络安全审查,是国家安全审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总计接报网络安全事件49605件。

目前,网络产品和服务供应链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数据安全风险在未来将更加突出。

为应对网络安全形势,网络安全审查制度需要与时俱进。从《国家安全法》明确建立国家安全审查与监管制度和机制,到《网络安全法》确立了网络安全审查的主要客体与主体,中国一直在努力保障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杨旒旒认为,此次《办法》落实对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最新要求,是中国依法治网的具体发展和生动体现。

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周辉看来,《办法》的有效落实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积极配合,既要有关监管部门依法严格履职,也要有关基础设施提供者、网络平台运营者主动合规,还需要社会公众的舆论参与和监督。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